乔伊斯与鲁迅短篇小说比较

王　友　贵

鲁迅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文坛泰斗，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乃闻名于世的文苑巨擘。对于乔氏，国内以往的评论在艺术上大多论及其新奇怪异的艺术手法，对小说创作技巧的贡献，在思想上则几乎只谈其冷漠、消极、悲观的一面，而对他从事写作的初衷，尤其是他早期的思想、作品等，却鲜有论述。这事实上使我国读者误解乔伊斯，也妨碍我们对乔氏作一全面、公正的评价。笔者在学习中，深感乔氏早期的生活经历、创作动机与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鲁迅先生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与鲁迅的短篇在创作动机、主题、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类同甚多。若将两人的同异，尤其是同，作一比较，我们既可从新的角度加深对鲁迅的了解，又可廓清对乔氏的误解，还其原貌、全貌。这对了解一位重要作家的思想嬗变过程，不无裨益。

一、类似的生长环境孕育出类似的创作动机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是周氏长男；周家乃逐渐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41年前，即1840年，英国侵华，首次鸦片战争爆发，结果是东方的这个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乔比鲁小130天，亦是乔家长子；乔家在爱尔兰属中产阶级。早在1169年，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用武力逐渐使这个西方的弹丸小国沦为殖民地。中国和爱尔兰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曾在漫长的岁月里充任亚洲文明的中心，爱尔兰亦从六世纪起统领欧洲文化达300年之久①。然而两国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后，殖民主义者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控制与渗透。两国经济日见恶化，民族文化渐遭毒化，民族心态变态扭曲，殖民主义者的文化犹如鸦片，毒蚀着民族的文化和心态。青年时代的鲁迅和乔伊斯对此感受尤深尤烈。

鲁迅的少年时代，家中突遭变故，家道中落。年仅十几岁的鲁迅“经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②。乔氏其时亦因家道衰败，成为当铺的常客③，乔家为躲债频频易址。鲁父病笃和乔母病危时，两家全靠典当维持。青年鲁迅为医治国民病体东渡日本学医，乔氏20岁上赴巴黎习医，两人均很快弃医从文。如果说两人习医的动机大相径庭④，那么促使他俩操笔的初衷颇多相似。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这样论述鲁迅从文的因由：“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的感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乔在1904年给当时的恋人诺娜的信中这样坦露心迹：“我在思想上摒弃整个爱尔兰的现行社会制度、基督教、家、道德准则……现在我要以我的笔，我的言行向它（教会）宣战”⑤。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名曰《呐喊》。呐喊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

说得明白："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就在这篇"自序"中，鲁迅谈及其从文动机，"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他数次把旧社会比作"漆黑的染缸"，指出"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⑥，因此需要更多的旧社会的"破坏者"。1929年，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集《阿Q正传》出版，鲁迅在"序"中点明《阿》的创作意图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904年，乔写出首篇短篇小说《姐妹们》，十年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以下简称《都》）问世。他在给该书出版商G.理查兹的一封信中阐明自己的创作动机："我的目的，乃是撰写一章我的祖国的精神史"⑦；15天后，在给理查兹的另一封信中他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写出一章我的祖国的精神史，这样，我实际上已向争取祖国精神解放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⑧。鲁迅认为"最要紧者是改革国民性"，乔欲争取爱尔兰族的"精神解放"，用何手段？二人同取文学。如果说两人均未成为医学界的医生，那么我们可以说，两人此时想做更重要的、更大意义上的"医生"，他们的"病人"是各自的国民。

二、类似的创作动机写出主题相同的作品

以文治病，自然是治思想上、精神上的病。国民"有病"的主要病态之一，就是麻木不仁的心态——精神"瘫痪"，这是贯穿两人短篇小说的一大主题（鉴于我国读者相当熟悉鲁迅小说，为省篇幅计，以下举例比较分析鲁乔作品时，略前者，详后者）。

乔氏短篇小说凡15篇，悉数收入《都柏林人》。全书贯一大主题，即精神瘫痪。书中人物或体瘫，或体健精瘫。开篇《姐妹们》即写一神父体瘫一段时日后归天，其体瘫的原因，作者暗示是精瘫。当时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统治爱尔兰，但在精神上统治爱尔兰的却是天主教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开篇我们看到精神统治者瘫痪了。此后出现的人物，无论长幼睿智，尊卑贵贱，只要他（她）滞留爱岛，无一成功，无一胜利，无一幸福，一句话，无一正常。

《一朵浮云》里的小职员小钱德勒与《端午节》的小官吏方玄绰一样自视清高，一事无成；《同事》里的法林顿、《寄宿舍》的多伦与吕纬甫、孔乙己之麻木不仁、愚懦无为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示众》里跷首候观游街犯人的人群，《白光》中16次落第，终至神经失常惨死水中的秀才陈士成，《药》中费尽心机让病儿食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及全家的愚木不正是精瘫的症状么？

如果说"精瘫"是总病根，那么它的种种症状在两人小说中清晰昭明，随处可见。

"爱是社会的纽带"，也是社会生活正常与否的表征。《都》中所有主人公，鲁迅小说的多数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能爱人，也不被人爱。《都》中成年人若非鳏夫，便是老姑娘（《悲痛的往事》的达菲、《土》里的玛丽亚、《姐妹们》的两姊妹等）；年轻人或欲爱不能（《伊芙琳》），或根本无爱（《两骑士》的莱内汉和科利、《寄宿舍》的多伦与房东女儿等）；即令已婚者，不是视婚姻为樊笼（《一朵浮云》、《同事》），就是同床异梦，婚姻名存实亡（《死者》）。全书找不到一例真情实爱的情侣，半例幸福美满的夫妻。鲁迅小说中，夫妻亲朋之间，人与人之间同样很难见到真诚持久的爱。《孤独者》中终身不娶的魏连殳，其古怪脱世与脱世古怪的达菲不啻伯仲；涓生和子君（《伤逝》）已经死亡的爱情

与《死者》名存实亡的婚姻相对应；《离婚》中爱姑与丈夫的离异，鲁迅其他小说中过多的寡妇——单四嫂子（《明天》）、灰五婶（《长明灯》）、祥林嫂、吴妈、八一嫂（《风波》）等，莫不让人感到爱的贫乏。即便是夫妇同在的《幸福的家庭》里，主人公“他”也只能生活在锱铢必较、子泣妻吼的家庭里，毫无爱可言。乔鲁笔下人物之所以大多如此，盖起于同一病因——“精神瘫痪”。

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不能成功，不能各得其所，那么这个社会必定出了问题。乔鲁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屡屡受挫，只败不胜。《姐妹们》里的弗林神父、《阿拉比》中的“我”、伊芙琳、《车赛之后》的吉米、《寄宿舍》的多伦、《同事》的法林顿等，《都》中所有留在祖国的爱尔兰人，无一得志，无一成功，连初始洋洋得意的加布里埃尔（《死者》），末了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这一主题宛若一根无形的琴弦，缀连全书各篇，无一例外。它不住地、执拗地向读者弹奏一个音调：殖民时代的爱尔兰“瘫痪了”，爱尔兰人患了“精瘫”。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也是一挫再挫，不见成功。孔乙己、N先生（《头发的故事》）、阿Q等一败涂地，方玄绰、陈士成、四铭、涓生等只输不赢，还有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概莫能外。最可悲的是，这些“病势沉笃”的人对其所处的危境，自己的“病势”毫无知觉，鲁迅和乔氏对此尤为忧愤。鲁迅在散文诗《复仇》(二)中假耶稣受难的故事表达了对当时国人精神麻木状态的憎恶与愤懑；乔氏在致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运动领袖之一的格雷戈里女士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离开爱岛的感受：“我似乎是被赶出我的祖国的”⑩。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在爱尔兰立足呢？除去当时爱尔兰无所不在的宗教氛围使不信教的乔无法容忍，那病气十足而又昏妄无知的社会也使敏感的乔感到窒息。正是鲁乔二人这种忧愤焦虑促使他俩创作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阿拉比》和《死者》这样发人深省的不朽名篇。

“精瘫”的另一症状是人物或彷徨迷惘，缺乏人生目标，或道德沦丧，自甘堕落。阿Q、小D与尽日游荡、无职无业的“两骑士”同属流氓无产者，小钱德勒、加布里埃尔和高老夫子、四铭、方玄绰、吕纬甫等同属“长衫阶级”。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似撞钟和尚，糊涂度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读者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甚。

《姐妹们》中的弗林神父死后，前来理丧的奥鲁克神父忙于办理的是死者的保险金；《阿拉比》那位死去的神甫生前反复赏玩的书是一本臭名远扬的大骗子写的颇多淫晦暗示的《维道克回忆录》；基翁神父（《纪念日，在委员会》）四处奔波，为的是一桩“生意”。如此多的神职人员佛戾教义，触犯教规（贪婪、好色），在宗教色彩极浓的爱尔兰，乔氏此笔寓意深长：作为爱尔兰民族“精神领袖”的天主教会尚且如此，整个社会之腐败，道德沦丧可想而知。相对而言，鲁迅对宗教的鞭挞着墨不算太多（《祝福》算一例），但他对封建社会的礼教，世俗社会的腐败，贪利忘义的揭露同样入木三分。《孤独者》中有三次送殡，一次是魏连殳丧父，一次是他祖母病殁，最后一次是他本人归西。三次他的本家亲戚都赶来他家，或夺屋，或分财。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本家亲戚“路远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可在他穷途末路，生活无着时，从无亲戚伸手相助。就连他本人，后来在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重压下，扭曲变态，自甘堕落，做了军阀的爪牙，整日花天酒地，行令猜拳。他向友人表白，“我已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鲁迅笔下这个人物同样寓意深远：一个卓尔不群的人

终于出污泥而有染，与人渣同流合污。

爱尔兰姑娘决定离开爱尔兰，与外国水手私奔。行将登船之际，她突然中风一般呆定在码头上，口不能言，腿不能动。这是一幅象征意象丰富的画面，象征爱尔兰人的“瘫痪”，也象征新的一代也染上了“瘫痪症”。伊芙琳的悲剧在她的不敢行动，无法行动，仿佛一张看不见的巨网缚住了她的手脚。与此相反，乔伊斯本人一九〇四年与爱尔兰姑娘诺娜私奔，离开都柏林，此后除一九〇九年夏返都柏林省亲月余，再也没回爱尔兰，似乎爱岛是个“瘫者”的大病场，长住于彼难逃“中风”或“瘫痪”厄运。方玄绰可谓“动脑不动手”一类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想得多，做得少，几乎是只想不做，只思不行。他和鲁迅短篇中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形象都有一个通病：有思想，有欲望，有冲动，却鲜有行动，无法行动。这不能不说是与“精瘫”有关。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⑪。这“奇妙的逃路”之一便是幻想、梦想，空中楼阁、画饼充饥式的胡思乱想，籍此自我麻醉，自我欺骗，逃避现实。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没想到也是爱尔兰人的痼疾。这一点鲁乔二人的小说中均有浓绘重刻，成为“精瘫”又一表证。《阿拉比》和《姐妹们》中那两个男孩“我”更多的是生活在幻想与梦境中，以逃避冰冷无生气的现实；成年人小钱德勒的自由和幸福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在现实里他一事无成，连自己吃奶的婴儿都哄不住；老一辈的玛丽亚（《土》）丑陋过人，却常自欺自哄，俨然那喀索斯再现；电车上那位使她“心潮澎湃”、她眼中的“绅士”临了扒走了她煞费苦心买来的礼物；当她以为万事如意之时，她的手却触到一碟土——象征死亡的土。小说的高潮，她应邀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歌名是《我梦见自己住在……》⑫。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属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子君和涓生的生活看来初始幻想多于现实，及至不得不面对平乏而冷酷的现实，结局便是一死一伤（“心的创伤”）。《幸福的家庭》里的“他”逃避琐屑无聊的家庭生活的方式是构思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幸福的家庭”。

对于两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读书、写书不失为避世之道，“奇妙逃路”之一。不过，这里的写书，并非指真正的创作，而是仅指想象中的写作。小钱德勒走投无路之际便拿起拜伦的诗集，方玄绰在计穷时亦捧起胡适的《尝试集》。达菲唯一真正的朋友是书，涓生为躲避冰冷的家，躲避“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跑到通俗图书馆，沉溺于“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士兵”中。小钱德勒唯一顾盼自雄之时是他想象自己写作的情景，过屠门而大嚼；《幸福的家庭》的“他”生活在左支右绌，毫无幸福可言的家庭中，他所要描绘的“幸福的生活”连他自己也觉得“哪儿也放不下”，纯粹向壁虚造，画饼充饥。

逃避现实还有其他方式，这在两人作品中同样有表现，从一般的手段，如酗酒（穆尼、辛尼科太太、克南先生——孔乙己、吕纬甫）、宗教（法林顿太太——祥林嫂）、隐居或自我流放（达菲——魏连殳），到最极端的手段，如自杀或死亡(辛尼科太太——陈士成)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述。

以上撮要比较了鲁迅和乔伊斯短篇小说的同。需要指出的是，二人其时既不相识，亦未曾受对方任何直接影响。身处亚欧两洲的两位小说家在同一时间，萌发同样的创作动机，开掘着同样的主题，塑造出形神极其相似的人物群像，倾吐与发泄同样的忧愤，希冀着同样的结果（唤醒昏睡的国民）。这，绝非巧合。这与他们所处的相类似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三、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封建社会逆子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指出："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⑫。鲁迅与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两个世纪相交。当时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横行无忌，欺凌弱小民族，一面是弱小民族反帝情绪高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一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者愚弄、蒙骗人民，一面是人民的大多数居危不醒，处于愚昧麻木的昏睡状态。1899年，义和团起，提出"扶清平洋"，反帝斗争与民族意识高涨。鲁迅其时就读新学堂（矿路学堂），逐渐接受新思想。1902年，他留学日本，大量阅读新书刊，受同学、老师（如章太炎、陈天华等）及日本和国内反帝爱国运动影响，入光复会，积极投身反帝反清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鲁迅所耳闻目睹的现实却是大多数国人麻木不仁，昏昏蒙蒙。当时的中国，正如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一面是反清抗洋的革命志士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一面是蚂蚁一样多的同胞蜂拥围观被捕、被游街、被当众砍头的革命烈士。鲁迅深切感受到国民劣根性的可怕、可悲、可叹，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对国民精神的腐蚀毒害，由此萌发唤醒民众，"要肃清"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这个肮脏的旧茅厕"的念头。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启蒙、觉醒，投身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阶段，为他立志"做旧社会的破坏者"奠定了思想基础。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高涨。爱尔兰著名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1846——1891）领导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声势不小，成就彰著。乔父是个近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巴涅尔的追随着，喜在亲友间谈论爱尔兰政治和民族运动，乔从小在思想上，尤其在政治上受父亲影响。此时的爱尔兰，由于受英国长期统治，残酷压榨和压制，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寥寥，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封建农民依然存在"⑭，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保守派、天主教会势力强大，人民的大多数昏妄麻木，沉溺宗教。1887年，巴涅尔被诬犯有政治谋杀罪；1889年，爱尔兰人W.H.奥希提出与其妻离婚，理由是巴氏与其妻通奸。顿时，爱尔兰的保守势力、天主教会、巴涅尔的政敌，甚至他多年的战友、助手全都一拥而上，攻讦巴氏，欲置他于死地。一年后，巴氏大业未成，含恨辞世。在乔氏父子看来，巴涅尔没有死于与英国人的斗争，而是死于爱尔兰人的保守、愚昧和背叛。当时年仅九岁的乔伊斯愤然提笔，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还有你，希利》⑮，表达他对本族人背叛行为的怨怼和谴责。这一时期的爱岛政坛风云为乔一生对爱尔兰族的劣根性，即保守、偏狭、虚伪、愚妄、不思进取、宗教狂热、落井下石等的看法定下基调。他由此放弃了宗教信仰，摒弃了当时爱尔兰的现行社会制度，决心向教会、民族的劣根性宣战："现在我要以我的笔，我的言行向它（教会）宣战。我无法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共存，只能流浪四方，浪迹天涯"⑯。乔伊斯和鲁迅这两个封建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产生于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们醒悟后抱定的决心也是如此相似。

四、同途不同归

乔鲁二人的同更多表现在前期。两人同是本阶级的叛逆；前期两人都曾一度孤独（乔在思想上可谓终身孤独），都曾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同是无神论者，都不信教；都仇视虚伪的封建道德、伪善的宗教；两人一生坦坦荡荡，在作人与作文上都鄙视虚言谎语；同样性格

倔犟，傲骨铮铮；同样憎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为爱国主义者。在文学创作上，乔鲁虽然都深受域外文学的影响，且都以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但是，他们的创作之笔始终不离故土，不离自己的同胞。从他俩笔尖流出的是辛辣的嘲讽，无情的剖析，对同胞的怨和忿。怨忿，是怨其不争，忿其麻木。值得注意的是，他俩的短篇数量不多，故事简短单一，但笔简意饶，寓意深刻，富象征意象，因为他们的主旨不在讲故事娱人，而在"醒世"；与此前和当时许多文学名家不同，他俩的笔从不写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而是倾全力写"小人物"，普普通通的人；他们都不把主要笔墨去写要人、坏人、恶人，而是写不坏的人，不好也不坏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社会的主体，不如此，不能真正"写出……我们国人的魂灵"，不能真正"提供一面供国人自观反省的镜子"⑰。

他俩的异首先表现在其成年后所走的不同道路上，由前期的同巨异微到中期、后期的异巨同微。这里姑且这样勾勒两人所走的人生轨辙：

鲁迅：启蒙——觉醒——愤懑——斗争（投身革命实践写作）——彷徨、寻找、斗争——不脱离革命斗争、找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民族英雄"

乔伊斯：启蒙、觉醒——愤懑——"自我流放"、斗争（写作）——"自我流放"（脱离爱尔兰、脱离爱尔兰民族斗争）——彷徨、寻找——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⑱（不久放弃）——远离爱尔兰民族斗争、永远"流亡"海外——消极、颓唐、自我封闭——客死异乡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从前期即在与乔氏的同中有着根本不同。鲁迅不惟以笔作武器，还投身革命斗争实践中，成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中的一分子；他不仅前期，而且中期、后期始终一贯地甘作中华民族的普罗米修斯，"窃天火，煮己肉，照人间"。他不仅以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五代现当代中国文学家，更以他的人品、以他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鲁迅实现了他的创作意图。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唤醒了无数中国人，在中国文坛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真正起到了他所期望的"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的作用。而乔氏长期侨居欧洲大陆，逃避爱尔兰，逃避爱岛本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过着"自我流放"的隐士生活。长期的自我封闭的生活反过来作用于他的思想，使他青少年时代即萌生的自我中心意识逐渐膨胀，早期的怨愤不满演变至玩世不恭，由抗争到"超脱"，由早期对外部世界的关心转向专注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近乎封闭的个人内心世界。这大大削弱了其作品的感召力，使他的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文学圈内，未能真正起到他自己先前希冀的"争取爱尔兰民族精神解放"的作用。

乔伊斯和鲁迅两位文坛巨擘以类似的经历，相同的创作动机开始文学生涯，但结局和实际作用殊异。同途不同归。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这篇小文所得到的启示。

注释

①《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伦敦，1976年版，568页。

②《鲁迅全集·呐喊》自序，415页。

③《乔伊斯传》，R·艾尔曼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71页。

④鲁迅赴日先学矿务，很快改习医。据他自己说，他是抱着治病救国双重目的习医。乔氏赴法学医纯属个人一时兴之所致。

⑤《乔伊斯书信选》，R、艾尔曼编，伦敦，费伯出版社1975年版，25页。

⑥《鲁迅全集·两地书》，26页。

⑦《都柏林人》研究版（以下简作《研都》），纽约，海盗出版社1969年版，269页。

⑧《研都》，277页。

⑨见《乔伊斯传》，101页："这位作家（乔伊斯）将以爱尔兰人为其病人，解剖爱尔兰，清洗、净化爱尔兰……"

⑩《乔伊斯书信选》，8页。

⑪《鲁迅全集·坟》，241页。

⑫由爱尔兰作曲家M、W鲍尔夫（1808-1870）作曲，词作者不详。第二段歌词是：我梦见住在大理石厅，/臣子和奴仆待候两厢；/在这众人聚集的厅堂，我是大家的骄傲、希望！/我有无数金银财宝，/我出身高贵门第；/但我最快活的是梦见/你爱我仍然真心实意。

⑬《瞿秋白文集》，卷三，97页。

⑭《乔伊斯书信选》，125页。

⑮"Et Tu, Healey"。蒂姆·希利是巴涅尔的助手，在巴最困难时，希利"背叛"了他。见《乔伊斯传》，32-33页。

⑯同注释⑥。

⑰《研都》，286页。

⑱当时的"社会主义"名目繁多，内容各异。乔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曾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但连他本人后来亦承认其"社会主义思想"不稳定，可能是冒牌货。事实上他所接触的并非我们所指的符合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见《乔伊斯书信选》，126页。

·书讯·

邓双琴副教授的《外国文学名著论》出版

我校中文系邓双琴副教授的《外国文学名著论》最近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川大学教授石璞和我校教授苏恒为此书作序、跋。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融教学和理论研究为一体。它涉及的范围是大学本科教学中的重点作家和作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教学要求。作者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的，很能启迪读者的思维，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此书不仅涉及作家作品，也有思想根源的探讨、时代背景的介绍，还论述了某些作家的美学思想，作家思想与作品艺术，作家局限与社会时代，可谓纵横交错。其中有综合论述，也有专题探讨，有较强的透视力，故读后能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了解，提高阅读欣赏和批评的能力。作者用生动而通俗的语言，简洁地介绍了几百年来欧洲乃至东方的一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并对所涉及的作家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但不乏趣味；对作品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但不乏生动，这很适宜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特别是业余爱好者；本书有较丰富的资料价值，对那些想问津外国文学而苦于无从起步者则是很好的"导游"；对那些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者则能为新的探索打下良好的基础。

（杨亦军）